

中国国民党 台湾四十年

史

1949 — 1989



本书是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较为全面的研究中国国民党退台后四十年历史的专著。它以翔实的资料、新颖的观点和流畅的文笔向广大读者揭示了退台后中国国民党历史演进的内容和特点。书中对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确立、台湾经济“起飞”的原因、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国民党在台的三次“改造”、以及国民党政权核心更替变迁等重大历史问题，均做出了叙述和评价。本书将帮助您全面地了解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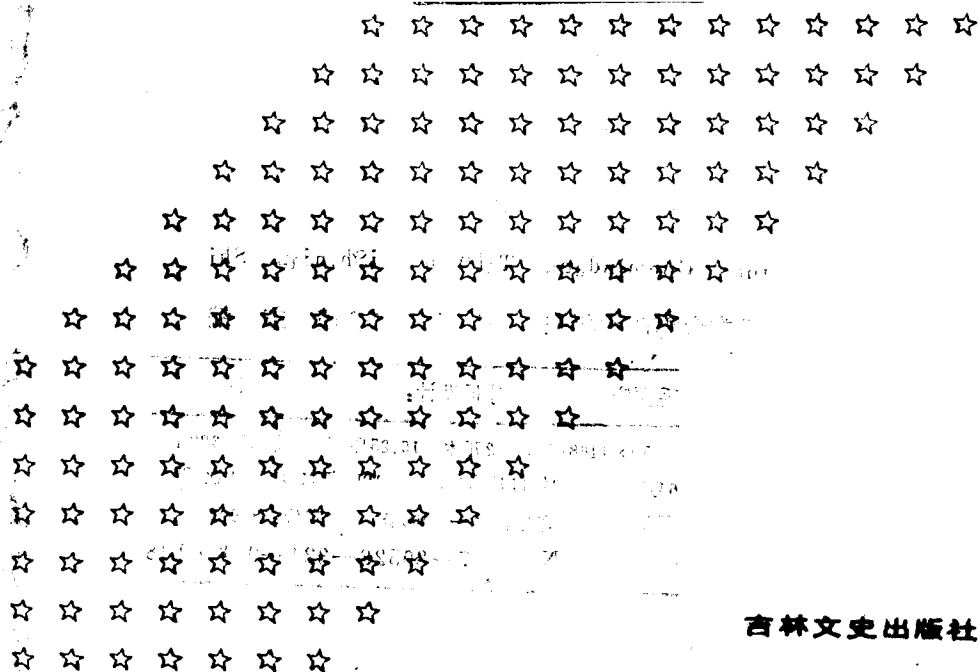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國國民黨台灣四十年史

DH72/07
屈武



主 編 宋 春
于文藻
副主編 王淑珍
姜 杰
耿麗華



吉林文史出版社

Zhongguo Guomindang TaiWan SiShinian Shi

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 宋 春 于文藻 主 编

责任编辑：毛振家 封面设计：王 潇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25印张 插页 382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永昌福利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000册 定价：8.9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324—9/k · 148

序 言

屈 武

国民党退台后的40年（1949—1989年），是它90多年历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既是它在大陆时期历史的延续，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应变求存、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在大陆统治的覆灭，它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地位和作用。然而至今它仍然是统治台湾地区的执政党，是关系到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重要因素，认真研究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与现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项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40年来国民党的行动轨迹，既有和大陆时期的相似之处，又有与之不同的历史特点。退台后，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在继续推行和强化大陆时期统治体制的同时，又实行了一系列不同于大陆时期的政纲政策和措施。并且利用外国势力的扶助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机会，在政治上获得了相对的稳定，经济上也有了较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它曾先后三次对其党务进行改造。50年代初期的“改造”，在台湾确立了“蒋介石时代”；70年代中期的改造，又确立了“蒋经国时代”；80年代中后期所推行的“党务革新”，带动了“政治革新”，则为“李登辉时代”奠定了基础。

4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由50年代的“武装反攻”，到60年代的“以政治反攻为主”，到70年代的“以三民主义光复大陆”，进而发展到80年代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同时，两岸关系也由敌对状态到趋于缓和松动，由长期隔绝到互相交往。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已成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

但是，国民党在其40年的历史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它在

大陆时期固有的矛盾，在某些方面虽然有所缓解，但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在它解除戒严和开放党禁之后，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党内外矛盾尤为突出。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是，近一个时期种种迹象表明，它在进行着“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活动，并在两岸交往中不断设置人为的障碍；对于日渐嚣张的“台独”势力的扩张，也采取纵容的态度，这些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统一”与“台独”已经明显地摆在国民党领导人面前，需要审慎地作出历史抉择。我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和有识之士能够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能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作出积极的反映。

中国国民党台湾40年历史，是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全面地、客观地、系统地研究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分期、政纲政策和实践活动及变化，把握其演进特点和发展规律，既是一项填补我国历史研究空白的任务，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这部由东北师范大学宋春教授、于文藻副教授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1949—1989年）是作者两年多以前所著《中国国民党史》（1894—1949年）的姊妹篇，也是近年来关于台湾问题研究的一项可喜成果，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台湾时期国民党历史的第一部专著。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国民党的历史与现状，对于这40年国民党历史上的人物、事件、会议、政纲及政策、活动等诸方面均作了客观、公允的评述，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见解。作为一个20年代加入国民党，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愿为祖国和平统一贡献余力的老人，我对这本书的问世感到格外高兴，并愿借此向广大读者推荐。我希望，广大学者加强对台湾国民党史和台湾社会的研究，拿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前 言

一、《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 的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现代史上有着近90年历史的大党。它在台湾时期的历史，既是其大陆时期历史的延续，又是在台湾特定环境和条件下的自我发展过程。随着历史的变化，国民党已不是全国性政党，而是掌握台湾政权的地区性执政党。国民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政党中的一个政党，它在台湾时期的历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是研究国民党由大陆退居台湾后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一本专著。政党是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实现阶级统治权的政治组织。它所代表的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来是通过建立或巩固阶级统治权得以实现的。国民党亦然。它退台后的四十年，随着社会基础、政治形态和组织状况的变化，其党的性质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逐渐由退台前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逐步地转变为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但是，国民党的活动重心和大陆时期相同，仍然放在确立和巩固阶级统治权的一党专制上。因此，研究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方针政策及自身实践活动的变化，揭示其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本质特征，是《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研究的核心。根据这一研究对象，本书的研究范围或内容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在台湾演变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国民党四十年来的演变，是与台湾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相关联的，可以说这是我们研究台湾时期国民党史的基本出发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国民党生存发展的政治需要，党外势力或党外运动的发展，是国民党演变的基因。台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变化，是国民党演变的外部条件。只有从上述条件出发去研究国民党台湾时期的历史，才能揭示发展规律和特征。

第二，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演变。这是国民党在台四十年历史演变的主要内容。退台后，国民党根据一贯的一党专制或“以党领政”原则，重新建立起在台执政的中央或地方组织系统，并陆续进行了重大调整。国民党根据不同时期的统治需要，实行了若干次大规模的党务革新改造，重建并扩充组织，以党务革新带动政治革新，至使其社会基础、权力结构、组织状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国民党组织形态的变化，既可认识它自身演变的历史，又利于把握它政党形态转变的取向。

第三，国民党政纲政策的演变。国民党自七大以来所制定的政治纲领，是它阶级意志、党的意志和政治目标的集中体现；为实现这一意志和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和策略，则是其必要的方法和手段。国民党的政纲政策最集中地反映了它所代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是判定国民党性质和特征的重要标准，也是台湾时期国民党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国民党在台湾的实践活动。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年成败是非的评价，不能只从它的言论去考察，重要的是看它的行动。国民党的政纲政策通过它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研究国民党的实践活动，是把握其“党治”运作和台湾社会政治发展轨迹的主要线索。

第五，国民党与其他在野党派的相互关系。国民党与随之退台的民社党、青年党有过合作关系，但随着国民党专制的强

化，它们之间也曾存在矛盾或对立。在长期的“党禁”时期，国民党压制新党的出现；被迫解禁后，新党的陆续建立，遂使国民党与新党之间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斗争，并日趋公开化。国民党与其他在野党的对立关系，是台湾政治斗争中的一种表现，也是制约国民党政治取向的因素之一。忽略这方面研究，亦无法客观反映国民党在台湾历史演变的全貌。

第六，国民党在海峡两岸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及作用。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演变，既是其政党利益的集中表现，又是国共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研究国民党在统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原则政策和具体行动，对于结束海峡两岸长期分裂对峙、实现祖国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我们研究国民党台湾时期历史的一个归宿。

总之，就是要全面而系统地阐明国民党在台湾历史进程中各阶段的发展变化、实践活动及其所起的作用，客观而公正地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揭示其演变的客观规律性。

二、《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 的历史分期

通过划分历史时期进行系统性研究，是我们编著《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所遵循的基本方法，目的是从国民党在台湾历史过程的不同时期的质的差别中，揭示其历史发展特点及其规律性。

然而，对国民党台湾时期的历史进行分期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因为系统地研究国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刚在起步，其历史分期自无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国民党在台湾时期的历史分期标志又远不如大陆时期那样明显或容易把握，而划分其历史分期绝不凭主观臆断，必须有客观根据，以符合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要有科学性。所以，它并非是件易

事。

本书对国民党台湾时期历史分期的客观根据是：其一，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及演变。国民党退台后历次代表大会或全会所制定的政纲政策，是其在一定时期内为达成政治目标而决定的重大政策性见解和具体行动准则，一般说来大都带有阶段性，应当作为历史分期的重要根据。然而，它绝不是唯一根据。国民党此时期制定的政纲政策中，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上，往往具有连续性或长期稳定性。将其作为唯一根据，亦难对它的历史分期实行科学划分。其二，国民党实践活动中一些带有划期标志的重大历史事件。受制于内外因素的影响，国民党在台湾历史演进中，发生过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事件。它们既是此前国民党自身演变作用的必然结果，又对其后来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而成为历史分期的根据之一。其三，在国民党历史演变中起最终决策作用的领袖人物的活动。国民党的历史活动向来是由其领袖人物组织领导。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党政大权独揽于一身并处于最高决策地位的领袖人物，如蒋介石、蒋经国及李登辉，往往对国民党的发展方向起决定作用。尤其是后两者在其各自主政期间，既有对前者党治传统的继承，又有超出传统的创新，使国民党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亦当成为历史分期的一个根据。上述三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弥补、相辅相成，共同作为我们划分其历史分期的客观根据。

据此，本书将国民党在台湾时期的历史，划分为七个具体的时期：

（一）从1949年12月国民党中央“播迁”台湾至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是国民党改造和在台湾统治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活动重心，就是克服由大陆统治崩溃而带来的重重危机，稳定社会，从根本上确立在台湾的统治，以站住脚跟，安身立命。蒋介石于1950年3月复职视事，颁布施政纲领，培

植亲蒋班底，重整党政军权力核心，是“挽危自保”在组织领导上的准备。在总结大陆失败教训基础上，蒋介石以“中央改造委员会”为工具，重整国民党，开始退台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党务改造，彻底清除党内非蒋派系，强化集权专制的党务体制，建立蒋介石为绝对权威的权力核心，首次实现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并组建中央至地方一整套严密的组织体系，确定“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和权力运作方式，在“政策协调”上强化对行政系统和民意机构的掌控，以此作为确立或巩固国民党对台统治的中心环节。国民党还以党务改造带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造，以为摆脱困境和稳定统治秩序的实际步骤。政治上，保持虚名的全国政权架构，重建“中央”和地方两套重叠的行政权力机构；厉行“法治”；通过地方自治把地方的管、教、养、卫政治事务纳入国民党监控之下。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财政经济，逐步实施耕地“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的土地改革，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达到乱中求稳。思想文化上，以文化手段进行反共宣传；推行所谓“三民主义救国教育方针”，加强对各级学校和学生的控制；强化反共的思想理论体系和党内“政治思想训练”。出于确保台湾、严控社会和维持国民党统治制度的需要，蒋介石仿效美军建制重建军事体制和军事首脑机关，并实行“监军制”，在“精兵”政策下全面整训军队和全力争取美国援助；重建并统一了“情治系统”，进行血腥恐怖的特务活动；通过颁行“戒严令”实施全面戒严，并严禁党外组党，实行一党独裁。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争取在台统治和生存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国民党推行了一系列“反共自保”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争取美国庇护及军经援助，以在台湾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推广各项政纲政策，建立国民党统治权威，国民党七大是承上启下的一次大会，它既是国民党改造结束的标志，又是国民党起死回生的历史转折点。

（二）从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结束后至1957年10月国民

党八大，是国民党开始“复兴建国”和统治秩序的稳定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活动重心，是在继续加强美台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定统治秩序和巩固国民党的权力核心，推行“三民主义模范省”建设，增强自我发展的实力，准备将来“反攻复国”的基本力量。国民党七大后，随着美国对台“中立化”的解除和军经援助的增加，以及美台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确立，增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安全感和“反攻复国”的信心，获得稳定在台统治的外部条件，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骚扰由此加强起来。但此时国民党的实力远不足以“反攻大陆”，国民党便利用七大后的有利时机，开始所谓“复兴建国”。经前一时期的改造运动，国民党暂时度过难关并奠定了生存发展的内在基础。于是，开始大力推行“民生主义建设”。继“公地放领”之后，此时期又深化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农民缴清首期地价同时，把土地所有权从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稳住了农民，增加了农业生产，国民党当局亦由此控制了粮源。国民党当局自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期建设计划，借以争取美援实施建设，达到经济上“自给自足”。此计划虽未完成，但它促进了经济稳定。“美经援”在台湾经济恢复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它既解决了主要建设资金来源，又缓解了巨大军费开支造成的压力。国民党把党的重建视为“复兴建国”的治本环节，强调一切“从头作起”，加强组织基础，扩大党员“实践活动”，实现“科学化”、“组织化”和“制度化”，以强化“党治”，推广各项工作。为维护国民党法统和蒋介石独裁地位，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一届“国大”二次会议上任意修宪，假借民意，使蒋介石连任“总统”，罢免李宗仁，补任陈诚为“副总统”，建立起“蒋陈体制”，继续推行“五权宪法”、“民主宪政”和“地方自治”，巩固国民党统治权威，以适应稳定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此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发生的“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台湾局势稳定的情况下，美台

合作中的矛盾和蒋介石政治独裁的加强。1957年国民党八大是其政纲政策演变和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宣布国民党从此由“确保台湾”、“建设台湾”，“转入反攻复国的实际工作阶段”。

(三) 从1957年国民党八大至1969年3月国民党十大召开前，是国民党“反攻复国”和强化一党专制的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活动重心，是对大陆实行“军事反攻”，同时加强政治和文化上的集权专制，集中力量发展台湾经济，达成不再需要美援的目标。此时期以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大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国民党在军事上加紧“反攻大陆”准备，在美国参与下对大陆侵扰升级，并建立“临战体制”和陈诚为首的“战时内阁”。国民党把半数以上的军队集结于外缘岛屿，主要是金门、马祖地区，于1958年8月至10月与大陆展开激烈的空战、炮战和海战，但受到重创。国民党复于1962至1963年派出40余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又全部被歼。国民党深感“反攻大陆”计划难以实现，遂于1963年九大确定了“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改作长期打算，由大规模军事对峙转为局部范围的军事对峙。在政治上镇压新党运动，强化国民党专制，将雷震等人组建的“中国民主党”扼杀于襁褓之中。国民党当局不顾党内外人士反对，于1960年3月一届“国大”三次会议上，继续以修宪手段使蒋介石连任“总统”职务，为其终身制的合法化制造法律根据。在经济上继续推行第二、三期“四年建设计划”。实行由内向至外向的经济转型，以解决1000万人口的生存发展问题。在对外关系上，美台虽与1958年10月发表《联合公报》，确认金门、马祖与台湾，澎湖在“防卫上有密切之关联”，但美国强调其主要途径是“实行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美国插手台湾和金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故无意介入中国内战，美台之间酝酿着新的矛盾。日台关系也因日本与大陆贸易问题而趋于紧张化。第二阶段，国民党“反

共复国”势头减弱，姿态大于实质，实行“消极偏安”，并筹组所谓“反共联盟”以图与大陆长期抗衡，除1965年发生两次海战并遭重创外，再无短兵相接的军事行动，政治和外交对峙实质上取代了军事对峙。1966年2月，国民党当局操纵一届“国大”四次次会议使蒋介石连任“总统”，严家淦为“副总统”，并在“创制”、“复决”等问题上“完善”了国民党法统。国民党在政治集权同时，文化专制也由此加强起来。1965年12月，国民党查封了具有反文化传统、反独裁专制倾向的《文星》杂志，后又逮捕主要作者李敖，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国民党通过对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当前文艺政策》的实施，在“反共”和“国家至上”口号下，强化了对台湾文艺界的全面控制。国民党还在岛内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维护“传统伦理道德”，重振沦落的社会道德和风气，抵制“全盘西化”观念，建立“文化自信心”，借传统文化来维护国民党道统和专制制度，并以“复兴中华文化”为旗帜推行反共政策。从1963年起，台湾经济结构中工业首次超过农业，进入经济“起飞”时期，工业增长迅速，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国民党当局制定并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以利于国民党统治。此阶段国民党外交上存在暗流：美日对台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并与台湾疏远。国民党当局在联大的“代表权”亦逐步呈现危机。

（四）从1969年国民党十大至1975年4月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交替，是国民党统治困挫与自身发展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活动重心，是被迫实行“革新保台”和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党务改造，进行经济调整，克服经济萎缩，以应付内外困境，实现国民党最高权力的交替，稳住国民党的统治地位。70年代初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国民党统治面临困挫。在“保钓事件”中，国民党当局坚持丧权的基本立场，失去了在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岛内学生、民众中的市场。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

合，导致其传统外交体制总崩溃，首次在台湾民众面前暴露出国民党统治基础的虚弱性。台湾新生代知识阶层和随台湾工业化而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外交挫败和核心权力交替的转折关头组合起来，形成《大学》杂志集团，针砭国民党法统和专制制度，要求政治革新。党外势力进一步提出参政要求并进行政治活动，冲击着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党内“贪污”、“偏私”等腐败之风盛行，侵蚀着国民党的肌体。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直接引起台湾经济萎缩，暴露出台湾经济本身固有的诸多问题。面对岛内外的沉重压力，国民党被迫重新考虑它的统治政策。对外采取应变政策，以加强台美“实质关系”为核心，与其他国家进行“弹性外贸”和“经济技术合作”，来维持外交残局。对内实行“革新保台”。1969年国民党十大曾根据调整内部权力关系的需要通过政治革新要案。会后为应付危局而加快政治革新步伐，并把它与蒋经国接班部署结合起来。1972年2月，一届“国大”五次会议使蒋介石连任“总统”，严家淦为“副总统”。严遂即辞去所兼“行政院长”职务，由蒋经国接任。会后改进选举办法，增选部分中央民意代表。蒋经国上任后，重用部分台籍人士参政，并担任要职，开始初步推行“本土化”政策。党务革新是政治革新的重要环节，它从1972年3月国民党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改组中央机构，推行党政分工，调整决策程序，强调党务与学术结合，改进人事制度，实行“新人新政”，贯彻“任期制”、“轮调制”和“退休制”。同时开始对基层党组织整顿。这次党务革新未超出专制政党体制的限制，视为“蒋介石时代”的党务革新，实际上是国民党退台后第二次大规模党务改造的第一阶段。国民党在经济上实施紧缩措施，并为解决能源、运输和重要原材料进口问题，开始实施“十项建设”。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召开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开始“蒋经国时代”。

(五) 从1975年4月国民党第十届临时中央全会至1981年3月国民党十二大召开前，是国民党新“强人政治”开始和“本土化”政策全面推行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活动的重心，是建立和巩固蒋经国为首的中央党政权力核心，深化党务革新，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整顿和控制，扩大国民党在台湾的社会基础，“发挥党的力量”，突破台湾面临的逆境。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在国民党中的领袖地位于1976年国民党十一大得到巩固，并形成新的权力核心；复经1978年一届“国大”六次会议，蒋经国接任“总统”，至此形成新强人党政集权格局。国民党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国民党十一大确定了党务革新的新方向，将“结合民众”和“为民众服务”作为党务工作重点，要求扩大国民党“民主功能”和“战斗功能”，“巩固社会基础”，实行党的决策和行政贯彻“一体制”，开始“蒋经国时代”的党务革新，亦即国民党第二次大规模党务改造的第二阶段。国民党广泛征收党员，加强基础组织建设和整顿，从组织和思想上强化对党员控制；促使党员干部“向下扎根”，深入民间，作党群之间桥梁，并以“民众为群众基础”，组训民众，对民众团体实行控制；要求国民党领导层实行“行动领导”，接触民众和解决实际问题”，克服“形式主义积习”。国民党力图通过深化党务革新改变传统形象，使党务体制和社会间关系得到一定加强。1977年11月发生的“中坜事件”表明党外势力已无法容忍国民党长期的独裁专制，是党外运动兴起的标志。1979年12月的“高雄事件”又把党外运动推进一步，要求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国民党专制制度和台湾政治多元化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突出，迫使国民党把政治革新提上日程，尝试建立“开放性政治常规”和“理性的民主秩序”。1979年12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维护“宪政体制”和厉行“民主法制”原则下，改革政治缺失，扩大政治参予。1980年，国民党恢复对中央民意代表的增额选

举，以赢得选举作为国民党革新的首要任务。全面推行“本土化”政策是国民党党务或政治革新的实质性内容，它在此一时期已达定势阶段。台籍人士在国民党中常会占1/3，并超过全部党员的半数。国民党五院中皆有台籍人士担任要职。几度增选的中央民意代表，绝大部分是台籍人士，台湾省级或省以下地方政府的重要职位几乎全由他们担任。台籍社会群体成为国民党社会基础的主体，国民党由此演变为地区性政党，其政治形态亦发生重大变化。为改善经济结构，国民党当局推行了“六年经济建设计划”，并在“均富”原则下“开发偏远地带”。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和与大陆建交，这是国民党30年来“遭受的最大冲击”。美台确定新的“关系法”，实际实行“一中一台”政策。国民党全面调整对外政策，开始推行“弹性外交”、“实质外交”和“国民外交”。

（六）从1981年3月国民党十二大至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是国民党“大陆政策”转变和实行“全面革新”时期。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活动重心，是在中共提出“和平统一”、台海内外要求国共再度合作的形势下，被迫松动“大陆政策”，“拒和偏安”，拖以待变。同时进行国民党退台后第三次改造，以党务革新带动政治经济全面革新，调整统治体制和对内政策，“化被动为主动”，适应台湾政治多元化发展趋势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维持国民党统治。这一时期以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国民党“大陆政策”转向缓和，全面革新徘徊不前。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放弃“武力统一”老调，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明其“大陆政策”的重大变化和“偏安拒和”的立场。这次大会制定的国民党政纲根据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提出“发挥宪政功能”，“促进政治革新”。企图通过改进选举和人事制度，健全“司法体制”、行政系统和民意机构，促进地方自治，扩大“宪政绩效”，来继续维护国民党的法统。但因蒋经

国健康状况而产生党内“权力继承危机”，使政治革新无甚进展。1984年2月一届“国大”七次会议除继续选举蒋经国任“总统”外，还选举李登辉为“副总统”，使蒋经国的接班人问题合法化，“权力继承危机”得到解决。1985年11月，蒋经国就继续革新问题提出10项指示，徘徊局面遂被改变。后一阶段，“大陆政策”被迫放宽，全面革新付诸实施。1986年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视为此阶段起点，全会决定加快“贯彻民主宪政行动”，以“党务革新”带动全面革新。会后成立12名中常委组成的革新小组，拟定6项革新议题予以推广。党务革新方面，着重改进国民党的组织、训练、社会、文化和海外工作，发挥“组织效能”，提高“竞争能力”，以适应新形势。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党务革新”未深入展开。政治革新方面，解除“戒严令”，颁行“国安法”；开放“党禁”，民进党等新党陆续建立；充实“民意机构”，建立资深代表退休制，实施地方自治“法制化”。经济革新方面，调整劳工和赋税政策，革新财经制度，加速产业结构调整 and 自由化经济发展。大陆政策方面，开放赴大陆探亲制度，放宽对大陆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但其大陆政策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国民党企图以台湾模式与大陆和平竞争，继续长期对峙。

（七）从1988年1月国民党临时中常委会议至1989年底，是国民党新的历史转折时期。蒋经国的逝世结束了国民党内蒋氏“家长制强人权威政治”，资历不深的台籍人李登辉继任“总统”和国民党主席。又标志着国民党历史上“李登辉时代”或“多元势力均衡”局面的开始。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活动重心，是建立李登辉主政的“党政一元领导体制”，协调党内和党派间的政争，维持国民党权力核心和政治统治的运作，在岛内外新形势下寻求自我发展，并与大陆抗衡，维护对外“政治实体”形象。蒋经国去逝短期内，国民党内各派就主席职位展开争夺，但最终在维护传统“一元体制”共识下，临时中常委会议